

习近平关于政治监督的思考与论述

杨艳芳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学院 650500)

摘要:在社会主义中国,作为强有力的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政治主体,因而对它所进行的监督乃是政治监督的核心。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从怎样实施党内监督、怎么强化群众监督以及如何形成监督合力三个重要维度对政治监督做出了诸多重要思考、探索与论述,这些精彩而准确的论述无不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真理之熠熠光辉。因此,学理透视习近平关于政治监督的深度思考与重要论述,应当从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和监督合力三重维度加以展开。

关键词:习近平;政治监督;党内监督;群众监督

习近平关于政治监督的思考与论述,散见于其会议报告、座谈会和各类批示等文本之中。对这些精辟的论述加以精准解读既是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监督的思想与实践重要特征的需要,也是继续推动我党的科学政治监督向纵深挺进的内在要求。

一、党内监督:解决国内和党内突出问题的重要着力点

时至今日,无论是从整个队伍的规模来看,还是从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效率而言,抑或是从民众的满意度层面加以透视,我们都会发现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执政党。这显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优势所在,但我们却也不得不承认由此给党和国家带来了诸如学者所言的重大难题:“如何监督政府是最为根本也是最为困难的事情。”[1]对于这一重大难题的思考与解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某些经典理论话语,或许能够为我们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一种思想启迪。恩格斯说过:“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2]据此,我们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只要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展开党内监督行动以充分发挥头雁效应,全社会的群众监督也就会自然而然地跟着走。于是,习近平明确指出:要加强党内监督、行政监督等,还要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和监督体系。并且,在此基础上“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3]从实践操作层面来看,巡视组的巡视工作几乎渗透到了全国各个地区的各个单位和部门,因为它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党和国家领导人敏锐地发现,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也如同世界上其他各政党一样,存在着一个较为突出和危险的问题——不愿展开具有实质意义的党内监督、不敢进行深层次的党内监督,乃至抵制党内监督等丑恶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习近平在《全面落实党内监督责任》中明确指出:“全党要深刻认识到,党内监督是永葆党的肌体健康生命之源,……”[4]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根本的、第一位的。”[5]习近平之所以将党内监督称之为“最根本”的监督,则是因为党内监督是使各类不同形式和内容的监督结合起来以形成监督合力的基础与核心。

需要注意的是,党内监督不能够仅仅依靠政治口号和政治宣言加以实施,而是需要有科学的制度体系加以保障。习近平在《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中指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6]从根本上来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管理和治理国家的实践,这是广大人民群众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权力。但是,众所周知的是,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法治轨道上正常有序地行使能够造福人民,而若是在法律之外行使且又不受任何监督则必然会祸害百姓和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也必须被限制于法律和制度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毋庸讳言,这是解决当前中国备受关注的贪污腐败问题的重要锁匙。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描述成一个按照“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原则管理的无产阶级社会,而这句格言对实施这一原则的制度安排却几乎只字不提。[7]因此,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启迪之下建构出一整套适合本国国情的法律与制度体系以保证权力始终牢牢地被关在制度的笼子当中。同时,又必须建构一整套关于政治监督的制度体系,以保障各项监督的正常有序进行。

二、群众监督:实现为民执政与靠民执政辩证统一的强大后盾

人民群众对政治活动的多角度监督,是保证政治主体的政治实践始终围绕广大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加以展开的重要路径。习近平在强调:“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始终与人民同心、同呼吸、共命运。”[8]在这一论断中,我们能够看到习近平不仅强调群众对党组织的监督之重要性,也注重中国共产党对群众的教育和引领,因为只有强化党组织对群众的教育和引导,群众对党组织的政治行为的监督才会更加精准有效。

正如不少学者所发现的那样,中国长期以来都存在一个现象:很多出自中央的方针政策本身是正确科学的,然而到了地方就变了形、走了样。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观察到以这一严重的问题,他曾在《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谈到,人口众多、疆土辽阔的中国,使很多远离中心发达大城市的县级领导或者是乡镇级领导比较容易产生“山高皇帝远”或者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错误念头,他们甚至天真地认为既然上级的领导和监督鞭长莫及便可以在小地方为所欲为。因此,常年在这样的污浊政治生态之下工作,如若没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服务理念与忘我精神作政治上、生活上的“定海神针”,就极有可能在渗透于社会诸多角落的各种“糖衣炮弹”的重重考验面前丧失定力并最终导致在与外在环境的斗争和自我革命与斗争中败下阵来。[9]实际上,这恰恰也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边远地区的政治行为更需要群众的积极监督。在上级领导的政治监督难以触及的地带,地方领导极容易蜕变成威震一方的“土皇帝”,因而必须依托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监督以防止在小地方养出欺上瞒下的“诸侯”。

人民群众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权力,显然不是让其以权压人、以权谋私和借权害人的,而是要其借助所掌握的权力科学调配社会资源、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以开展利国利民之大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组织行使权力就应当自觉接受群众的全方位监督。因此,习近平强调:“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10]首先,群众的监督会使执政党倍加珍视手中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防止其滥用权力。其次,倘若有部分党员干部以权谋利、贪污腐败,通过人民群众的监督就能够将其揭发并予以惩治。再次,群众在监督政府官员的政治行为之时正是行使了自己的监督权,由此便会使他们在此过

程中体会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内涵,也会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效果的群众满意度和信任度。

值得注意的是,群众监督应当是无禁区和无死角的,这就意味着任何政治主体在开展政治活动之时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监督。因此,习近平曾说:“我将……为国尽力,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重托。”[11]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斩钉截铁地声明了他的态度:自愿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既是基于对建党以来近百年历史的沧桑巨变之深刻总结,也是对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由于对领导人缺乏监督所导致的重大失误的深刻反思。回望历史,我们会记得,正是在一些诸如“句句是真理”之类的激进思路、口号和话语引导下,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遭遇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挫折。但是,问题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这些激进的话语,而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并未真正意识到最高领导接受监督的必要性。好在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再以“救世主”的面貌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对所有的政治主体都必须借助法律制度的约束和群众的有力监督。

时至当前,得益于网络技术尤其是移动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群众监督已有了与以往大不相同的途径。习近平强调:让互联网“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12]借助发达的移动网络技术,人民群众可以更加便捷地监督政治主体的政治实践,使所有的政治主体皆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展开其政治实践,使政治主体的一切行为真正符合为民执政的价值取向。但是,群众监督所体现的却并不仅仅是为民执政的维度,也彰显了靠民执政的层面。当然,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监督过程中被调动之后,他们能够提出的意见并不局限于如何进行监督的问题,而是会涉及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实践的方方面面。

三、监督合力: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的相互深嵌和良性互动[13]

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尽管有着不同的路径和各自显著的特征,但他们并不相互冲突也不相互排斥,二者在实际监督实践中往往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由此构成监督合力方能使政治监督势如破竹,亦使从严治党鲜有漏网之鱼。习近平曾明确地指出:“要把党内监督同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同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协调起来,形成监督合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4]习近平之所以要郑重地强化党内监督,是为了在更大程度上保证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重视强化群众对权力的无死角、全方位监督,则是为了始终保证权力源自人民、服务人民,以确保中国共产党的人民中心价值取向始终不变。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二者之间必须形成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积极效应和强大合力。

部分政府官员在行使权力之时所暴露出的官僚主义作风,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绊脚石也是人民群众所极不乐意看到的现象,而要消除这种不良作风则既要依靠有效的党内监督还有赖于群众的积极监督。习近平强调:“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坚决整治消极应付、推诿扯皮、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15]从归根结底意义上讲,无论是政治监督还是反官僚主义,其核心要义便是要使政治主体的权力行使方式变得更加的正确、科学和高效,而要达到这一极不容易达到的目的正是需要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的科学结合与辩证统一。习近平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中指出:“中央纪委、监察部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检查监督力度,执好纪、问好责、把好关。……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16]只有依靠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形成监督合力,才能使权力真正被关在制度的笼子里的同时又被充分暴露在扫荡阴

暗的烈日阳光之下。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实践并不是理论先行,而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实践尝试获得成效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领先超前,但是,有关理论研究却跟不上这种领先超前的现实。”[17]因此,诸多领域的理论亟待丰富、发展和升华,关于政治监督的思想理论也不例外。诚然,以上解读和剖析仅仅只是对习近平关于政治监督的思考与论述尝鼎一脔,更多相关问题的思考与论述亟待继续加以深入解读和阐发。当然,更为重要和关键的是,必须在准确解读习近平相关论述基础上不断完善我国政治监督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 [1] 郑永年.保卫社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页.
 - [2]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5页.
 -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21页.
 - [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85-186页.
 - [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86页.
 -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29页.
 - [7] 潘毅等主编.社会经济在中国: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页.
 -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页.
 - [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42页.
 - [10]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7页.
 - [1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8页.
 - [1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6页.
 - [1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69页.
 - [1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74页.
 - [1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87页.
 - [16] 张一兵等著.照亮世界的马克思:张一兵与齐泽克、哈维、奈格里等学者的对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0页.
- 作者简介:杨艳芳,女,汉族,1992年5月生,云南祥云人,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学院助教、辅导员,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